

从标准化到精准化：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背景下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的演进逻辑及耦合机制^{*}

◎ 常凌翀

摘要：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从“标准化”向“精准化”转型，既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背景下政策导向的深化，也是数智技术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文章基于价值重构、技术驱动与治理嬗变三重逻辑，通过剖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上海“市民数字阅读”平台及浙江“健心客厅”等案例，揭示出转型进程中制度—技术互嵌、平台—资源联动、场景—需求共生三对关键耦合机制。这些机制共同推动服务体系从“资源中心”转向“用户中心”，实现需求动态感知、资源柔性组织、服务智能触达与效能多维评估的系统性重构。该研究不仅为理解全民阅读服务的演进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在精准化道路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全民阅读 公共文化服务 精准化 耦合机制 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G252

DOI:10.19393/j.cnki.cn11-1537/g2.2026.06.005

全民阅读的深度与广度是衡量社会精神风貌与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历经十余年的系统性推动，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公共阅读设施网络，全民阅读推广取得了规模性成效。然而，随着数智技术的浪潮席卷社会各个领域，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公众的阅读期待正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范式变迁：从对资源“可获得性”的基础诉求，逐步升级为对服务“适配性”、“品质感”与“个人价值”的高阶追求。这种转变，让过去那种追求“千人一面、书量达标、网点均匀”的“标准化”供给模式，在资源精准配置、个性化体验满足及服务可持续性上，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由此，全民阅读服务从“标准化”向“精准化”的转型，本质上成为制度规范、平台构建与场景需求三大要素深度耦合的系统性演进过程。这一转型通过制度与技术互嵌确

立运行边界与创新空间，依托平台与资源联动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智能调度，借助场景与需求共生将阅读服务嵌入社会生活脉络，最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资源中心”转向“用户中心”，实现需求动态感知、资源柔性组织、服务智能触达与效能多维评估的系统性重构。^[1]

一、引言：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的时代命题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事业从社会倡导迈入法治引领的新阶段。《条例》中诸如“科学合理规划全民阅读设施”“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调发展”等条款^[2]，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必须从同质化的标准化模式，转向能够精准响应不同群体、不同场景需求的差异化服务模式。这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系统性变革的“精准化”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升县级融媒体传播力研究”（项目编号：19BXW029）、2025年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明互鉴视域下南京国际形象的媒介建构与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5YB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法理依据与制度空间。^[3]《条例》的实施,推动着全民阅读工作的重心从以基础设施覆盖为主的“规模扩张期”,转向以质量、效能与体验为核心的“深度发展期”。

此阶段的根本挑战,在于如何将公共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日益个性化、多元化的阅读需求精准匹配。然而,当前实践却呈现出一种“系统失灵”的状态:标准化供给的惯性导致资源投放与真实需求脱节,“图书滞胀”与“活动空转”现象并存;而读者则在信息过载中面临“选择困难”,难以获取有效的个性化服务。因此,深入探索从“标准化”向“精准化”的演进逻辑,成为一项兼具理论必要性与实践紧迫性的时代命题。

在展开论证前,有必要对核心概念加以界定。本文所讨论的“精准化”,绝非单纯的个性化推荐技术,而是包含三个递进层次的复合型概念:其一,作为服务理念的精准确,强调从“资源中心”转向“用户中心”;其二,作为技术手段的精准确,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需求感知与智能匹配;其三,作为制度安排的精准确,通过弹性的资源采购与绩效评估为服务提供系统性保障。它不同于侧重个体偏好的“个性化”、侧重算法决策的“智能化”或侧重流程颗粒度的“精细化”,“精准化”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对三者的整合性表达,其要义是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将正确的阅读资源送达需要它的人。

深度阅读具有不可替代的认知特性,这使得本文所讨论的“阅读服务”无法被泛化为一般信息服务。其一,文本的线性沉浸要求读者在持续专注中完成复杂的意义建构;其二,意义的生成机制涉及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其三,阅读的深层价值往往在交流与共享中得以放大。因此,本研究所讨论的“阅读服务”特指以促进深度阅读为目标的公共文化供给。

本研究旨在超越对政策或技术的表层讨论,深入剖析全民阅读公共服务从“标准化”迈向“精准化”的内在逻辑与耦合机制。核心追问在于:驱动这一范式转变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制度、平台与场景等要素如何相互啮合,最终支撑起一个可持续的新型智慧阅读生态系统?对这一问题作出明晰的系统阐释,不仅能为《条例》的深入实施提供学理依据与路径参考,亦能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必要的理论思考与实践镜鉴。

二、问题的提出: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错位

当前,全民阅读公共服务面临着“供给侧的效率焦虑”与“需求侧的获得性沉默”并存的结构性困境。在供给端,基层服务者常受限于以借阅率和活动人次为核心的量化考核,导致资源投放与在地化、差异化的需求错位。更严峻的是,城乡间公共阅读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农村人均藏书量远低于城市,标准化供给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剧了“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而在需求端,读者在看似丰富的标准化资源供给中,却难以高效获取与自身兴趣、认知阶段或现实问题精准匹配的内容与服务。标准化供给模式的深层局限在于其“需求同质化”的前提假设,它优先保障资源分配的广度与公平,却难以回应用户对品质化和个性化的追求。这种供需间的结构性张力,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性的“服务失灵”,深刻揭示了以“管理便利”与“规模覆盖”为核心的传统标准化供给模式的内在局限。

《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的数据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虽然数字化阅读接触率已高达80.8%,但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81本,拥有深度阅读习惯的人群仍是少数。^[4]这意味着技术的便利并未自动转化为阅读的深度,普惠性政策在提升个体阅读深度方面效果有限,必须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服务。^[5]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要显著提升个体的阅读深度、时长与持续性,普惠性政策的效果仍十分有限,必须转向更具针对性、个性化的精准服务与干预措施。^[6]

《条例》的出台正是对这一系统性矛盾的制度性回应。然而,《条例》实施也并非坦途,地方财政配套能力不足、基层专业人才匮乏、部门协同壁垒难破等现实障碍,使得《条例》从文本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依然崎岖。精准化并非否定标准化的普惠价值,而是要求在普惠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备需求动态感知、资源弹性配置与服务智慧适配能力的新型系统。

三、演进逻辑:价值、技术与治理的三重奏

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转型,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一场由价值理念迭代、技术革命赋能和

治理模式嬗变共同谱写的三重奏。其演进逻辑呈现出从“资源中心”到“用户中心”、从“经验主导”到“数据驱动”、从“单点供给”到“生态协同”的清晰脉络。

（一）价值逻辑的重构：从“物的在场”到“人的抵达”

标准化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公共阅读资源在物理空间和制度层面的“全覆盖”，工作重心常落脚于馆舍面积、藏书数量、达标率等可量化的“硬指标”。这一模式实现了基本文化权益的托底保障，但其隐含的逻辑是“资源即服务”——只要资源在场，服务便自然发生。然而，这种“以资源为中心”的思维容易导致服务与真实需求相脱节，造成资源闲置与需求空置并存的尴尬局面。

精准化转型首先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它将评价的标尺从“我们提供了什么”转向“用户获得了什么”，服务的终极价值在于有效触达并满足具体的个人需求。全民阅读基础设施的功能正经历深刻演进，其核心正从提供物理场所与静态资源的“基础承载”，转向成为支持知识交流、服务创新与社群互动的“活性节点”。^[7]正如《条例》所强调的“有益于公民全面发展”，精准化服务要求将每一个读者的阅读体验、素养提升和精神成长置于核心地位，这深切回应了全民阅读内涵从个体文化权利向社会责任拓展的时代要求，服务供给必须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创造。^[8]

浙江省推广的“浙里阅”公共服务应用，其所依循的设计逻辑便不再仅仅展示图书馆藏书，而是深度融合用户的借阅历史、地理位置、阅读偏好、社交兴趣，主动推送附近的阅读活动、可预约的研讨室以及用户可能感兴趣的电子书。这种转变意味着服务的目标从确保“资源的随时在场”升维为实现“对人的精准抵达”，从保障“均等的阅读机会”深化为促进“有书香获得感的参与”。

（二）技术逻辑的驱动：从“辅助工具”到“核心引擎”

技术的角色演变是这场转型中最显性的动力。过去信息技术在阅读服务中多扮演着“自动化”与“数字化”的工具性角色，如图书管理集成系统、数字资源库等，它们提升了管理效率，但并未深刻改变供给系统的内在逻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群式突破，推动其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驱动精准化服务的“核心引擎”。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导研发的“文津搜索”系统，

整合了馆藏自建资源、外购数据库及部分地方图书馆的元数据，搭建起统一的检索平台。该系统于2025年版本中新增“智能推荐”功能，依托对海量用户行为数据的深度学习建立多维度兴趣标签模型。值得深入分析的是其背后的数据治理逻辑：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系统设计中引入了“用户授权—匿名化处理—定期清除”的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并在推荐结果的呈现上设置了“可解释性”标签（如“因您近期检索过‘敦煌学’而推荐”），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算法黑箱”带来的主体性焦虑。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2024年度用户调研报告，“文津搜索”系统的智能推荐功能上线后，用户满意度（推荐结果“符合预期”的比例）达到近八成。^[9]这一数据说明，技术赋能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算法精度，更取决于用户对推荐逻辑的信任感与可控感。云计算则提供了弹性、可扩展的算力与存储支持，为跨地域、跨机构的资源协同与敏捷服务交付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治理逻辑的嬗变：从“行政闭环”到“生态共治”

标准化供给模式通常由政府文旅部门主导，通过层级式的行政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任务下达，呈现出较强的“行政闭环”特征。精准化服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倒逼治理模式加快向开放与协同迈进。《条例》中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为治理嬗变提供了法理依据。治理逻辑正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直接供给”转向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生态。

政府的角色逐渐从“划桨者”转变为“掌舵者”和“平台搭建者”，其主要职责在于制定规则标准、购买优质服务、实施绩效评估、维护公平秩序。而各类社会力量则成为活跃的“划桨者”：专业的阅读推广机构可以承接社区阅读项目，如“老约翰绘本馆”与多地社区合作开展亲子阅读；知识付费平台“得到”可将其精品课程以公益形式接入公共数字图书馆；甚至热心的读者个体也能通过“图书漂流”“领读人”计划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贡献者。这种生态共治模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指令链条，而是形成了能响应需求变化的网状结构，极大地增强了系统的韧性与创新活力。

四、耦合机制：制度、平台与场景的深度啮合

精准化转型的真正落地不仅依赖于内部要素的耦合，

更需要在与外部实践的对标中找准自身的坐标。演进逻辑廓清了研究方向，而真正的落地则有赖于关键要素之间形成的稳定、高效的耦合机制。这种耦合不是机械的组装，而是有机的互动与增强。

（一）制度与技术的互嵌：为创新划定轨道与注入动能

制度与技术在精准化转型中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又彼此驱动的共生关系。技术若缺乏制度规范，极易滑向无序并引发伦理风险。譬如利用用户数据进行个性化推荐，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与数据安全法规的刚性约束下运行，以防范“算法黑箱”与“信息茧房”等问题。反过来，制度设计若脱离技术的可实现性，则难免沦为空中楼阁。上海“市民数字阅读”平台之所以能实现市、区、街镇三级资源的“一键检索”与智能推荐，背后正是统一的认证体系与元数据标准这一制度性基础设施在提供支撑。^[10]

更深一层看，这种互嵌不仅体现为对既有规则的被动遵守，更在于通过“监管沙盒”、地方试点等机制，允许技术在一定容错空间内先行试点探索，再将成熟经验转化为普遍制度，从而实现稳妥且敏捷的迭代演进。精准化转型的稳健性，来源于制度与技术之间持续进行的双向校准与适应性共建。技术为制度注入了高效落地的“引擎”，制度则为技术铺设了安全运行的“轨道”，二者在动态调适中共同形塑着转型的路径、速度与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嵌还涉及数据伦理与用户主体性的深层问题。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的实践表明，当推荐算法能够向用户提供“因您检索过某主题而推荐”此类可解释性标签时，用户对推荐结果的信任度与接受度显著提升。这提示我们，制度设计不仅要约束技术的边界，更要引导技术向“可解释、可问责”的方向演进，将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内嵌于技术系统的运行逻辑之中。

（二）平台与资源的联动：从“孤岛”到“大陆”的智能调度

资源分散、系统割裂是当前制约服务精准化的关键瓶颈。数字资源库彼此割裂、纸电资源管理脱节、活动信息碎片化，迫使读者不得不在多个平台间往复跳转，导致服务获取路径冗长、用户体验支离破碎。这种“信息孤岛”

状态从根本上背离了精准服务所追求的集成化与用户中心的理念。

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强大的智能中枢平台。这一平台不应止步于技术接口，而应升级为全域资源的智能“调度中心”与连接人与服务的核心数字界面。正如有学者指出，数字时代城市全民阅读生态的构建愈发依赖于此类集成化、可视化的交互平台，它通过融合离散的资源与空间，显著降低了公众的搜寻成本，从而整体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与体验流畅度。^[11]上海“市民数字阅读”平台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它通过统一的后台整合与智能推荐引擎，将原本彼此孤立的数字资源连接成一片“服务大陆”，实现了资源的云端聚合与按需调度。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集成，更是阅读服务从分散活动向集成化平台生态跃迁趋势的体现。^[12]

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正体现在其打破壁垒、促进资源高效流通与精准匹配的能力上。然而，仅仅拥有技术平台并不足够——平台的效能更取决于其底层数据标准是否统一、接口协议是否开放、治理机制是否透明。深圳“图书馆之城”的实践经验表明，行政力量推动下的统一标准是快速实现资源互联互通的有效途径；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SimplyE”平台则展示了另一种可能：通过开源技术与开放标准，吸引多元主体自愿接入，逐步生长出基于共识的协作网络。两种模式各有优劣，但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唯有打通“孤岛”，才能让阅读资源如活水般流动起来。

（三）场景与需求的共生：让服务在生活脉络中“生长”

服务的最终价值在于被使用，而使用总是嵌入具体的生活场景。精准化的高阶形态是服务与场景的深度共生。要实现阅读服务与生活场景的深度交融，关键在于主动“嵌入”而非被动“等待”。在家庭亲子场景中，公共图书馆可联合教育部门，将分级书单与共读课程精准推送到家长社群；在都市通勤动线上，可与交通系统合作布设“扫码听书”角，提供适配通勤时长的有声内容；在乡村生产场景中，农家书屋则应紧扣本地产业，通过技能电子书、专家连线答疑等方式，让知识服务直接回应田间地头的真实需求。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建设实践表明，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度“嵌入”乡土社会。这意味着空间

功能必须超越图书借阅,紧密结合当地产业特色、文化传统与居民实际需求,提供如农业技能培训、乡土文化传承等精准服务,从而转型为激活乡村文化、赋能社区发展的关键节点。^[13]浙江嘉兴的“健心客厅”将心理健康阅读与专业辅导融入社区公共空间,成功将普适性阅读服务转化为回应居民心理困扰的精准服务,真正成为家门口的“心灵驿站”。^[14]

“场景”的价值不仅在于物理空间的适配性,更在于能否促成深度的“意义生产”。在博物馆阅读场域中,通过将阅读活动与实物展品、情境叙事、沉浸体验相结合,能够激发观众超越文本的深度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及社区形成的“协同共治”网络。^[15]这启示我们,供给方必须跳出固有的“场馆思维”,主动将阅读资源嵌入多元社会脉络中,让精心组织的服务像空气一样随时浸润在需要它的地方,进而在场景的土壤中“生长”出极强的适配性。阅读,也由此不再是孤立的翻页动作,而成为一种融入生命历程的持续体验。

五、理论重构与系统进路： 迈向治理现代化的范式转型

前文从演进逻辑到耦合机制,逐步勾勒出全民阅读公共服务从标准化迈向精准化的实践图景。然而,这场转型若仅被视为技术应用或流程优化,则会遮蔽其深层意涵。本质上,它是一场公共文化治理范式的系统性现代化跃迁——涉及价值理念的重新锚定、治理结构的根本调整以及制度与技术关系的再平衡。将其置于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光谱中审视,可以发现它恰好呼应了从“管理主义”向“新公共服务”的范式演进,以及从“单一权威”向“网络化治理”的模式转换。下文将从理论对话与实践镜鉴两个维度展开。

（一）理论透镜：新公共服务与协同治理的对话

转型的价值根基深植于公共行政学从“管理主义”向“新公共服务”的范式演进中。新公共服务理论批判了将公民简化为“顾客”的工具理性,主张回归对民主价值、公共利益的承诺。^[16]回望全民阅读的“基础建设期”,其重心在于设施覆盖与资源增量,考核指标多为馆藏量、流通册次等“物”的维度,在本质上仍未完全摆脱以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思维。而精准化转型所倡导的“以

用户为中心”,正是对“服务于公民,而非顾客”这一核心价值的实践皈依。浙江“e家书房”的技术架构,其终极目的并非展示数据处理能力,而是为了实现将每位市民作为独特权利主体予以尊重的价值承诺——这标志着驱动力从行政体系内部的管理便利,转向切实回应外部公民个性化文化权益的诉求。

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可操作的现实路径。精准化服务面对的是用户需求高度异质化、利益主体多元的典型“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协同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指出应对此类复杂公共事务,必须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网络。^[17]我们在转型中观察到的实践正是这一网络的生动展开:在政企关系层面,体现为制度与技术的互嵌;在行政体系内部,其表现为以平台为枢纽的资源联动,如深圳“图书馆之城”通过行政整合构建高效的内生性流通网络;在跨社会系统之间,则发展出基于场景的深度协作,如英国“Reading Well”项目通过图书馆与医疗系统的“书目处方”合作,将阅读服务精准嵌入社会支持网络。

理论的并置揭示了转型的内在张力:它既要求坚定回归“公民本位”的公共价值,又必须务实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同网络。二者缺一不可——缺乏价值引领,协同可能异化为效率至上的技术管控;缺乏协同网络,价值愿景则易沦为空谈。因此,这场转型的本质是一项以公共价值为牵引,通过精巧机制设计引导资源与行动在协同网络中定向汇聚的治理工程。

（二）实践镜鉴：超越技术决定论与路径依赖

中外案例的深刻对比,为我们提供了超越单一思维模式的宝贵镜鉴。浙江“e家书房”与英国“Reading Well”的并置,展现了精准化的两种哲学。前者是“技术中台驱动”范式,依托全省一体化云平台与大数据,追求规模化、智能化的个性服务,可喻为一部“智能引擎”。后者则是“社会议题嵌入”范式,以回应国民心理健康问题为导向,通过跨部门专业协作实现深度社会干预,如同一剂精准的“人文药方”积极发挥社会疗愈作用。英国“Reading Well”项目由英国图书馆协会与心理健康慈善机构合作发起,针对焦虑、抑郁等常见心理问题,由医学专家编制推荐书目(“处方图书”),全科医生可将其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开具”给患者。^[18]前者代表了“技术赋能”的广度,后者彰显了“价值嵌入”的深

度。这启示我们,精准化绝不能窄化为单纯的算法竞赛,更应是与社会系统深度耦合的“社会系统工程”。

中外案例的对比,其价值并非为了评判优劣,而是为了揭示公共服务生态构建的两种普遍范式,从而为路径选择提供理论参照。深圳“图书馆之城”与纽约公共图书馆“SimplyE”平台的对比,揭示了生态系统构建的两种底层逻辑。深圳模式属于“行政整合型”生态,凭借顶层设计与统一标准,在短期内高效构建了统一服务体系,其优势在于行动的确切性与规模效应。纽约公共图书馆推动的“SimplyE”平台则是一个开源电子书阅读应用,通过统一的用户界面整合来自不同供应商、不同图书馆系统的电子书资源,并积极推动出版行业在图书馆电子书授权模式上的变革^[19],体现了“开放标准型”生态的逻辑——从下游体验倒逼上游规则变革,其优势则在于生态的灵活性与可持续性。如果说深圳模式如同精心规划的“运河体系”,那么纽约模式则更接近依托共识的“河道网络”。

对我国而言,未来的路径在于探索一种更具韧性的“混合模式”,即在行政整合有效保障的普惠性基础上,有机融入开放生态的灵活性与社会创新活力。例如,在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中设计标准化API接口,以“主干清晰、枝叶繁茂”为原则,有序引导优质的社会化数字内容、技术工具与社群服务以“插件”形式接入,从而构建一个“强公共性、高开放性”的可持续生态,既维护服务的规范性与公平性,又充分激发社会与市场的创新活力。

六、精准化转型的战略框架： 能力体系与演进路径

将前文阐发的价值理念与协同网络转化为可操作的系统性能力,是精准化转型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一跃。《条例》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创新阅读服务模式”等条款,为这一能力建设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然而,我国全民阅读面临城乡资源落差较大、基层运营乏力等复杂国情,这使得能力构建不能简单套用城市经验或技术方案,而必须在“需求—供给—交付—评估”四个维度上形成相互啮合、动态调适的实施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使命是将“公民本位”的价值承诺与“多元共治”的网络结构转化为服务系统可持续演进的内生动力。

(一)需求侧：动态感知与循证决策

精准化的起点不是“我们能提供什么”,而是“用户真正需要什么”。数字时代用户的阅读需求具有高度的情境性、流动性与隐性特征——一位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一位都市白领的职场技能提升需求、一位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需求,在标准化供给框架下往往被简化为同一套同质化的资源推送。因此,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行为数据+态度洞察”的混合感知模式。在量化层面,整合借阅记录、检索日志、空间停留时长等多源数据,运用聚类分析识别需求图谱中的潜在断层;在质性层面,引入参与式观察、焦点小组等方法,捕捉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情感体验与文化偏好。这一细节提示我们,感知能力不仅关乎技术精度,更关乎对用户主体性的尊重。针对《条例》明确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需将“精准普查”升级为常态化的“社会传感”系统,形成动态更新的“分众需求图谱”,推动资源配置从“经验驱动”转向“证据导向”。

(二)供给侧：敏捷响应与生态化资源组织

传统公共文化机构的科层结构在处理碎片化、异质性需求时往往力不从心。供给侧能力建设的突破口,在于注入“敏捷性”与“生态化”双重基因。所谓“敏捷”,并非简单追求速度,而是指组织能够围绕特定议题快速重组资源、试错迭代。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亦推动公共文体服务“上云用数赋智”,实现“闭门而不打烊”。这种跨部门协作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为公共文化服务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深圳经验。^[20]这一做法值得借鉴。更深层的变革在于资源组织模式的生态化重构:打破以行政采购为中心的封闭循环,推广“读者决策采购”(PDA)模式,让实时阅读数据直接驱动馆藏建设;深化“资源即服务”(RaaS)合作,使数据库、课程等资源能根据需求动态弹性接入;尤为重要的是设计激励相容的规则与开放接口,吸引出版机构、科技企业、民间读书会等多元主体,将其优质内容有机整合进公共阅读体系。由此,供给源头将从单一的行政系统,拓展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开放网络,资源的多样性、时效性与精准适配性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三)交付侧：嵌入式触达与关系建构

服务的价值最终在交付中实现,而交付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深度嵌入用户真实的生活情境。交付侧能力建设

需突破“场馆思维”与“独立App”的局限，推动阅读服务向“场景化生存”与“关系化增值”转型。浙江嘉兴“健心客厅”的案例耐人寻味：它将心理健康主题阅读与专业辅导精准嵌入社区公共空间，使一个普适性的阅读主题转化为回应居民心理困扰的精准服务，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心灵驿站”。这启示我们，交付不是单向推送，而是与用户共同创造体验的过程。

技术层面，应发展“可解释、可调节”的智能推荐，通过算法透明度增强用户信任感；策略层面，主动与政务App、社交媒体、智能家居等高频场景合作，以插件、小程序等形式提供“无感”服务；更高阶的目标在于数字平台培育“阅读共同体”——围绕经典文本或地方知识，通过线上共读、协作注解、作者对话等机制，将阅读从私人体验转化为公共对话。这不仅是服务形式的创新，更是对阅读社会性的重新激活。

（四）评估侧：价值衡量与闭环治理

精准化转型若缺乏与之匹配的评估体系，极易迷失于技术指标的表面繁荣。评估能力建设要义，在于建立一套能够真正度量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创造”的效能治理框架。过去以流通量、活动场次为核心的规模导向已显现边际效益递减态势——部分图书馆借阅率上升，但读者深度阅读时长并未同步增长。这意味着评估必须转向融合“覆盖面”（公平性）、“精准度”（响应性）、“参与深度”（黏性与投入度）及“社会影响力”（对个人福祉、社区凝聚的长远贡献）的综合性仪表盘。

英国“Reading Well”项目的评估经验值得注意：它除了统计借阅量，还追踪读者阅读后的心理健康改善情况，将服务效能与真实社会效益挂钩。评估体系的最终目标是形成“评估—学习—改进”的闭环治理流程，确保评估发现能直接反馈至预算分配、项目优化与合作伙伴管理，使整个服务体系成为一个具备反思与自适应能力的“智慧循环体”。

七、结语

从标准化到精准化，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转型是一场深刻的供给侧改革。它回应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蕴含的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也迎接着数智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一演进并非一蹴而就的切换，而是价值理念、技术应用与治理逻辑同步深化的过程。通

过本土实践与国际镜鉴的对比，我们看到精准化路径的多样性：既可以依托强大的技术中台实现广域资源的智能调度，也可以通过与专业领域深度合作实现对社会痛点的精准干预。

展望未来，精准化服务的崇高目标是让每一本书都能找到渴求它的读者。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有构建“智慧中枢”的技术雄心，还要有雕琢“润心细无声”服务的人文匠心，更要有锤炼“开放共治生态”的治理慧心。唯有坚持价值引领、技术赋能、治理创新三轮驱动，协同发力，全民阅读的公共文化服务才能真正融入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的肌理，为建设书香社会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源动力。

参考文献与注释

- [1] 谷征，彭博文，孙美玲. 多重耦合协调的阅读调查体系构建：德国经验与中国实践[J]. 出版发行研究，2025（5）：54-63.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Z]. 2025-12-09.
 - [3] 张文彦.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立法价值、重点内容与实施展望[J]. 编辑之友，2026（4）：17-22，29.
 - [4] 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EB/OL]. （2026-04-20）[2026-04-24]. http://zw.china.com.cn/2026-04/20/content_118447909.shtml.
 - [5] Tintarev N, Masthoff J. A survey of explanations in recommender systems[C]//2007 IEE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Engineering Workshop. IEEE, 2007: 801-810.
 - [6] 李武，谢泽杭，周冬. 全民阅读政策能否促进个体阅读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25（7）：85-94.
 - [7] 赵立兵. 全民阅读基础设施：概念、功能与实践路径研究[J]. 中国出版，2025（18）：40-45.
 - [8] 朱永新，罗晶. 从个体权利到社会责任：全民阅读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 中国教育学刊，2025（12）：15-21.
 - [9] 萨蕾，白琳，刘颖.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资源发现平台构建：以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为例[J]. 数字图书馆
- （下转第99页）

求的现实题材供给短缺,且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价值观、现实性方面的短板明显。最后,IP 衍生开发亦缺乏针对俄语用户的文化适配与版权协作,产业链存在明显短板,体现为数字版权授权机制低效,制约电子书/有声书落地;中俄产业协作深度不足导致本土化 IP 开发链条断裂。面对以上问题,唯有精准施策、系统破局,以翻译为桥、以内容为媒、以版权为链,构建起贯通人才培养、内容创新、产业协作的生态系统,方能使中国故事真正融入俄罗斯文化,实现中俄文化的深度交流。这不仅关乎产业利益,更是在“一带一路”的人文画卷上,增添浓墨重彩的互鉴篇章。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参看《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研究——以桐华小说 步步惊心 为例》《中国网络文学在俄语区的传播研究——基于对 Rulate 网站及其译者的考察》《中国网络文学海外社群的自助行为研究——基于俄罗斯翻译网站 Rulate 的考察》。

[2] 《2025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发布,网络文学迎来全球高速普及阶段[EB/OL].(2025-12-18)[2026-01-16].

<https://wap.bjd.com.cn/news/2025/12/18/11472236.shtml>.

[3]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24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R].北京: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24.

[4]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专家:俄罗斯人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兴趣日益浓厚[EB/OL].(2022-04-13)[2026-01-16].
<https://sputniknews.cn/20220413/1040662253.html>.

[5] 郭景红.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脉络与译介热点研究(1992—2024)[J].国际汉学,2025(6):37.

[6] 罗季奥诺夫,倪璐璐,张曼曼.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与出版研究(2009—2018)[J].俄罗斯文艺,2024(1):121.

[7][8]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墨香》:俄罗斯人为何爱上中国网络小说?[EB/OL].(2023-06-30)[2026-01-16].
<https://sputniknews.cn/20230630/1051458519.html>.

[9]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国网络小说的流行如何改变俄罗斯图书市场?[EB/OL].(2023-10-17)[2026-01-16].
<https://sputniknews.cn/20231017/1054168786.html>.

(作者信息:郭景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王纪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讲师)

(上接第 86 页)

论坛,2016(1):56-63.

[10]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海市公共图书馆条例[Z].2024-12-01.

[11] 张昱辰.塑造城市全民阅读生态中的数字界面:试论数字书店地图融合创新路径[J].中国出版,2025(20):52-56.

[12] 罗小艺,张晗.我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发展演变与效果分析[J].编辑之友,2025(4):16-24,48.

[13] 黄佩芳,苗美娟.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建设实践[J].图书馆,2025(8):91-99.

[14] “健心客厅”变身“心灵驿站”[N].钱江晚报,2024-10-11(6).

[15] 刘春荣,李贞实.意义生产与协同共治:全民阅读场域中的博物馆阅读[J].中国编辑,2025(8):41-45.

[16] Denhardt J V, Denhardt R B. The new public service :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0, 60(6):549-559.

[17]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4):543-571.

[18] The Reading Agency. Reading well : books on prescription[EB/OL].[2026-02-27].<https://reading-well.org.uk/>.

[19]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implyE : One app, millions of books[EB/OL].[2026-02-27].<https://www.nypl.org/books-music-movies/ebooks/simplye>.

[20] 关炜瀛.共促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社会:深圳市 2026 年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N].深圳特区报,2026-04-22(2).

(作者信息:常凌翀,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